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理查德·罗蒂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理查德·罗蒂 著

李幼蒸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和自然之镜/(美)罗蒂著;李幼蒸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ISBN 978 - 7 - 100 - 07778 - 1

I. ①哲… II. ①罗…②李… III. ①哲学理论—
美国—现代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930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哲学和自然之镜

〔美〕理查德·罗蒂 著

李幼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7778 - 1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7 3/8

定价: 58.00 元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Copyright© 197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2001 by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译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1981 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

“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 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



“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1年3月



中文本译者再版前言

《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初版于20年前。这是理查德·罗蒂迄今为止发表过的唯一一部系统性专著,其后发表的六七本书都只是论文结集。大约在本书中译本出版前后,罗蒂在其写作策略上作了重要改变,放弃了已宣布在进行中的有关海德格尔的专著写作(后来代之以一部主题大体相近的论文集),自此以后他就采取了以论文为单元的写作方式。实际上,罗蒂的新著大多是由一篇篇讲演稿编辑而成,这样他就把讲演、写作和出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写作策略上的转变,是与其自1982年以来在美国文化学术界采取的新哲学实践策略一致的。一方面,罗蒂自此永远脱离了哲学系而投入了一般文化评论和文学理论等在美更能发挥影响力的领域;另一方面他在哲学系之外仍然占据了针对主流哲学继续进行批评的有力位置。(目前罗蒂在任教的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中的身份是:文学理论教授和哲学教授。)其效果也是双向的:既在美国和世界人文学术各领域内提升了他作为美国代表性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声誉,又积极参与了推动美国人文学术理论新潮的活动。目前罗蒂几乎被认为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首席代表,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在某种意义上,罗蒂今日已享有了美国数一数二思想家的地位。应该指出,自杜威以



后没有任何其他美国哲学家能够再拥有这样的身份。(今日法国对于译介罗蒂比译介杜威更为积极可为其证。)五十年代以来活跃在美国的“思想家”大多来自德法两国。罗蒂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的这一文化空白。所谓思想家毕竟还须来自哲学界,而当代美国成就卓著的哲学家们却又过于专门化和技术化了。反之,罗蒂却能把欧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本土实用主义哲学相结合以形成一股得以影响大西洋两岸思想潮流的声势。当代美国重要文学批评家海罗德-布鲁姆甚至盛赞罗蒂为“今日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位哲学家”。罗蒂自访华(1985)和其书在中国出版(1987)以来国际声誉日增,这当然也是与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文化的特殊发展境况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了。

罗蒂接受的哲学训练是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却因后来转向现代欧陆哲学而离开了作为分析哲学重镇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然而实际上他对现代欧陆哲学的关注是相当有选择性的,并未深入若干重要领域,如德国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和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前者最终相通于主体、意识和意志等问题,后者最终相通于意义和价值问题。(本来罗蒂所关心的社会文化问题最终都与这些领域中的问题相关。)因此在他的心目中,今日世界上专业哲学理论的主流就是美国分析哲学,以至于他对后者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与其有联系的西方古典形而上学和现代逻辑经验论传统的。他并据此批评立场来检讨整个西方哲学史,企图否定古往今来一切朝向知识真理(主、客观实在及其意义)追求的认识论研究方向。这样,罗蒂思想从一开始就把两件事混合在一起了:特殊知识理论主张(一些西方哲学流派)和一般知识理论问题(这还涉及其他学科和其他文化传



统中的认识论问题)。他认为二者都涉及一个根本的认识论“偏见”,即真理问题。这样他也就不免简化了人类的求知情境,仅仅根据个人所把握的一时一地知识状况做出了普遍化结论,以至于被不少批评者称作“极端相对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却能使其在后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当代美国文化理论界大受欢迎;他对当前西方重要思想家著作的批评性读解更引起美国读者普遍的兴趣。结果,正是宏通的批评家罗蒂,而非是专业技术化的美国哲学家们,才能为青年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一种精神引导。把美国传统实用主义与欧陆后现代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这一新策略形象,使罗蒂成为“今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当代哲学家”(《纽约时报》语)。在美国,他通过实用主义读解欧陆思想;在欧洲,他通过后现代主义思想来读解美国实用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罗蒂通过否定各种普遍性真理观来坚持一种反真理观的普遍性立场。



在思想界趋于消沉的西方后冷战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罗蒂努力为美国校园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应当说,作为学术思想批评家的罗蒂仍然是比作为社会文化问题处方者的罗蒂更为人所称道。最近几年来,罗蒂越来越关心政治和社会道德问题,却反对对这类问题采取传统知识理性主义的态度。罗蒂一方面把“哲学修辞家”德里达尊奉为尼采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又告诫人们应放弃追求客观知识的幻想,于是这就相当于主张以主观“话语现实”取代客观社会现实来作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对象。罗蒂在其近著《哲学论文集:真理和进步》(1998)一书导言中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不存在真理。”他习惯于把一些传统哲学字词,如真理、理性、现实、知识等等,看作字词与概念合一的固定思

想单位,从而导致若干偏颇性论断。注意哲学语言问题的罗蒂应该想到,许多传统学术用语(由于其传统的实用性、直观性和自然性)已不宜于再充作现代精密思维的工具了。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化地用一套传统语言去取代另一套传统语言,以投合现行学术市场的“需求”,而应设法相对于已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和极大改变了的学术现实去重新设定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工具。这不正是我们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所看到过的趋向吗?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在社会科学中拒绝在自然科学中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呢?但是罗蒂并无兴趣思考这类符号学的和语义学的问题,更不会认识到人文学科制度本身也有改造的必要,这不反而表明哲学家罗蒂本人受到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本身的限制吗?罗蒂和德里达共同具有的自相矛盾的倾向是,既要“颠覆”传统哲学学科,又要在现实思想运作中借助于传统哲学学科。德里达需要哲学基地来反对“人文科学”和“跨学科方法论”;罗蒂需要用一套哲学术语来替代另一套哲学术语。他们两人都和我们一样不满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现状,却都反对追求哲学和人文科学重建的理性主义目标。译者对罗蒂批评西方哲学教条主义的精辟论断一向十分欣赏,却对其因忽略其他学科中的理论化进展以致反对人文学术科学化的态度难以苟同。但是毫无疑问,罗蒂思想,特别是本书,仍应被看作是考察今日西方人文思想演变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本书中译本出版以来,中外学术思想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当时我们对历经六七十年的中美哲学交流史还保留着某种浪漫的记忆,早年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往事,似乎还被视作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起点。以当代杜威自诩的罗蒂,在其初访中国时



也就自然会怀有某种相应的兴奋心情。十几年后的今日，罗蒂也会感觉到，已广泛进入世界学术环境的当代中国学界，与当时（主要通过日文）接触西学不过才十年光景的杜威来华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结果正如我在 1983 年美国西部哲学大会（由罗蒂安排的）中西哲学对话史分组会发言中指出的，中国学人既然已在原非所长的数理化领域达到世界水准，中国学人必将在原本所长的文史哲领域中同样达到世界水准。而且，这不仅是一种能力的问题，也是一种义务的问题。有鉴于此，中国哲学界现在所需要的已不是“消极受教”，而是“积极对话”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功利主义地以西方现有成就和方式当作固定的标准来规划和衡量我们的学术方向。然而中国学者为了更有效地参与今日世界哲学和学术理论对话，不可能仅以民族学术经典的独特性来实用主义地夸示于世，而须不断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全局，以期在人类共同知识的基础上除旧布新、言所当言。罗蒂为今日美国最富代表性的学者和思想界代言人之一，《哲学和自然之镜》又为其哲学思想的奠基力著，自然应当继续受到中国学界和思想界的认真关注。因此译者非常高兴十几年后此书能够在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为了使读者了解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哲学界与罗蒂学术交流过程的原貌，此书三联书店原中译本的版面内容未予变动。最后，感谢作者在百忙中为中译本再次撰写了序言；并感谢商务印书馆领导和责任编辑徐奕春先生热心安排了本书再版事宜。

李 幼 蒸

2001 年 8 月于旧金山湾区



中译本贺麟教授序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凯南讲座教授理查德·罗蒂的名著《哲学和自然之镜》的中译本就要和我国读者见面了，作者曾来信邀我为中译本写一篇序言。对于一个早年曾在美国研习西方哲学的中国学者来说，能为一部当代美国哲学名著的中译本作序，自然备觉荣幸和欣慰。

1982年前，当罗蒂教授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时，我们已有书信往还，不久后收到了他寄给我的这本书，读后颇有耳目一新之感。1985年夏，他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邀请来京、沪讲学访问时，我们有过几次接触。罗蒂专长当代哲学问题，但对西方哲学史兴趣浓厚，因而彼此交谈十分融洽，互相增进了了解。记得去夏某晚罗蒂夫妇冒着倾盆大雨来我家做客，在书房里我们畅谈了过去六七十年间中美学术交流的历史，对今日两国哲学界交往日趋密切同感快慰。

关于这本书的重要性和它在今日世界各国的影响，过去几年间国内书刊陆续有所介绍，我国读者已有一些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自本书出版以后的几年间，在美国几次哲学学会年会上罗蒂的讲演都成为大会瞩目的中心，特别是在1983年春旧金山的太平洋区分会年会上和同年十二月波士顿东区分会年会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思想曾引起热烈的讨论。罗蒂思想今日不仅成为美国哲学



界中一个重要话题,而且已扩大成为美国文化界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了。

罗蒂曾在分析哲学中心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任教二十余年,长期研究过分析哲学的各种问题,并有突出建树。六十年代末以来逐渐扩大关注范围,特别留心于现代欧洲大陆哲学思潮,因而扩大了视野,并从新的角度对当代美国主流哲学——分析哲学予以彻底反省。本书就是作者对西方传统主流哲学和当代美国主流哲学进行批判地再思考的产物,同时它还论及了哲学与文化关系这一涉及美国哲学前景的大课题。由于本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若干基本原则进行了剖析和批评,在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美国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难想象,罗蒂对一些分析哲学标准信条的挑战,不免会导致一些保守的哲学家的不满,于是在相对平静的美国哲学舞台上掀起了层层波澜。



谈到罗蒂的学说,首先会令人联想到杜威。对于杜威的哲学,我国哲学界其实是相当熟悉的。抗战以前的二十年间,在我国哲学界较具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也许首先应当一提的就是杜威、罗素和柏格森等。作为早先西方一代思想大家的罗素,既曾反对过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又曾对杜威及其门人的实用主义予以抨击(解放前我对他们各自的学术均有论述)。有趣的是,这两位学术上的对手二十年代初都曾来华访问讲学,并倾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趣致。杜威本人甚至延长了预定的访问时间,在华流连忘返,这已是哲学界一段熟知的轶事了。

其实,在现代西方哲学各家各派中,对旧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应该首推杜威。这不仅是由于胡适先生的提倡,而且也由于他

的哲学本身反对玄远,易于理解和便于应用。杜威和罗素尽管学术观点迥异,却都认为哲学应有益于社会 and 人生。两人都曾想通过教育运动来使哲学应用于社会和文化之改造。然而作为教育家的罗素却远不及杜威重要,杜威作为教育理论家的声望并不亚于其作为哲学家的声望。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尽管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在我看来,他所受到的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杜威和詹姆士。1947 年我在北大讲授现代西方哲学时,曾介绍过这两位美国哲学家。(参见拙著《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0—67 页)在这两讲中我论述了他们有关真理、观念、理念、本质、意识、身心关系和社会协调作用等几方面的反传统观点。我指出,詹姆士说“世界上没有超越于人的真理”,并“提倡情感、信仰、意志,而贬抑抽象思想”;他认为“要观察人心,必须从它的功用、机能活动诸方面去认识……。观念不是静止的镜子(着重号为此刻引述时后加,以示与本书中“镜子”隐喻的关联),而是有用的武器,有一套观念就有一套武器来应付对象,这些都是心理的功能”。我又介绍说,詹姆士认为“真理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或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范型,真理之是否确为真理必须看观念和它能引起的实际效果是否相合”,因此“真理就包括了‘观念的有效性’”,“效用就成了考验真理的标准”。这些观点与罗蒂在本书中提出的反柏拉图主义、反观念镜子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论述杜威时我侧重于他的真理社会观,于是所谓的“真理效应”就进而落实在社会“协合”(Coordination)观上了,这一点与本书中译本附录中收入的罗蒂在日讲演中宣称的“协同性”(Solidar-



ity)原则,可谓如出一辙。1928年我曾在美国哲学年会上听到杜威宣读他的论文,其标题即为“社会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记得当时听讲的孟泰格曾批评他把“社会”尊崇为黑格尔式的绝对者。我在北大讲演时也指出,杜威“想提出‘社会’作为认识论的一个范畴,作为批判哲学的一个标准”;并谈到“他反对把身心分开,也反对把心理现象分成知、情、意部门,心理学要研究的只是整个行为的调整协合、适应,也即行为的动态,而不再是旧式心理学家所瞩目的意识状态”;而他所谓的“协合”,则指“协合只是一种组织,一种使工具能够相互配合而达到某一目的的组织”,因此“协合就是一种适应”。这些说法与罗蒂在本书中花相当篇幅批评的西方传统认识论甚至在措辞上都十分接近。正是在杜威实用主义中,我们看到了对行为、效果、社会检验等罗蒂今日所重视的一些观念的强调,而反对传统心理学的心灵观和意识观,更为杜威和罗蒂共同坚持的立场。

在当时的讲演中我曾总结说,“杜威对于传统哲学的驳斥的确言之成理,但传统哲学在他所揭出的每一‘罪状’里面都依然保有从容答辩的余地”。这可以说是我当时对正在流行的旧实用主义的一般态度。当然,今日罗蒂新实用主义思想并非杜威旧实用主义的翻版,前者是后分析时代的哲学家,后者却基本上是前分析时代的哲学家。此外,关注当代西欧哲学思潮(主要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罗蒂,也与主要熟悉西欧哲学史的杜威(主要是柏拉图和黑格尔)具有着差距颇大的不同学术背景,这是时代演变的必然情形。我在和罗蒂交谈时曾提及二十年代末在美留学时听杜威和怀特海讲演的往事,而罗蒂亦谈到他曾是怀特海的高足哈茨霍



恩的学生。时光荏苒,竟然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对今日美国重新恢复了对杜威的重视很感兴趣,看来一位哲学家思想的影响,是随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起伏不定的。

《哲学和自然之镜》一书过去几年来引起了我国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很大兴趣,不时见到对此书的介绍和报道。而且这本书的部分章节也曾有人着手译过,如兰州大学中文系徐清辉同志(她于1981年到1982年间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进修美学,与罗蒂相熟)等;现在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李幼蒸同志将全书翻译出来,并增译了罗蒂的另外四篇文章,作为中译本的附录。李幼蒸同志曾在普大哲学系做访问学者,罗蒂为其联系人,其后转至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仍与罗蒂保持学术联系,对其思想做过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完成了本书的翻译。希望这个中译本能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贺 麟

1986年11月于北京



中译本译者前言

如果说第二次大战之后的二十年间,在美国哲学舞台上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主的分析哲学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的话,那么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哲学活动的构成却开始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内部反正统力量(如科学哲学内部的反唯科学论潮流,语言哲学内部的反传统意义论潮流)已逐渐崛起;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各哲学流派在美国得到了迅速扩展(在此以前它们在美国的影响极其微弱)。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哲学思想的分化更趋复杂,随着大量西欧哲学名著的陆续译介和各种哲学会议上的有关讨论,当代西欧哲学在美国校园和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东部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芝加哥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等都已成为研究和介绍当代西欧哲学的中心,西部加州贝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也已成为在分析哲学基础上研究西欧大陆哲学的重要基地。然而在大多数美国重点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哲学系中,分析哲学仍居绝对领先地位,因此谈到今日美国哲学时主要还是指分析哲学,这是从哲学专业角度来说的。然而一旦扩大到整个美国文化思想界来看,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许多具有明显西欧哲学倾向的哲学研究如今正在大学文学院内哲学系以外的其他人文科系(如历史系、政治系、文

